

“第三世界”：

社会、政权和军队

[苏联] 格·伊·米尔斯基著

商 务 印 书 馆

“第三世界”：社会、 政权和军队

〔苏联〕 格·伊·米尔斯基 著

力 夫 阜 东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年·北京

7.3.5,
Георгий Ильич Мирский
“ТРЕТИЙ МИР”: ОБЩЕСТВО, ВЛАСТЬ, АРМИЯ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6

“第三世界”: 社会、政权和军队

〔苏联〕格·伊·米尔斯基 著

力夫 阜东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冶金工业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3 1/2印张 277千字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300册

统一书号: 3017·269 定价: 1.05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中东和一些亚非国家的军事政变和军人政权的专著。作者格·伊·米尔斯基是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室主任，他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苏联现行对外政策的反映。

近年来，苏联为了遂其霸权扩张，口念“缓和”经，手执“天然盟友”幡，一直在第三世界或通过“军援”控制当地的武装部队，或直接间接用武装干涉来控制一些国家：从安哥拉到非洲之角，从印度支那到阿富汗，一系列的事件都证明苏联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与日俱增。然而，事实能教育人，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或正在逐步识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一些国家摆脱了或正在逐步摆脱他们的控制。

作者写这本书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是为苏联霸权主义服务的。然而，我们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苏联对第三世界军人政策的政策；同时，也可以了解第三世界的军人在政治舞台上出现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经济背景。

1980年2月

Y13 A331/8

目 录

第一章 军队登上政治舞台的前提·····	1
第二章 军事政变的原因和目的·····	65
第三章 军人执政·····	197
第四章 军队和革命民主·····	323
结 论·····	398

第一章 军队登上政治舞台的前提

殖民主义体系已经崩溃，世界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几十个新独立国家。列宁的预言实现了，他曾写道：东方的人民群众将作为独立斗争的参加者和新生活的创造者起来奋斗。^①继东方觉醒阶段之后，在现代革命中，东方各民族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时期到来了。^②国际关系中的新阶段开始了。

政治独立是从殖民统治下获得完全解放的第一步，是消灭各种形式帝国主义压迫的前提条件。但是政治独立还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剥削，不铲除这种剥削，就不能克服整个世纪的落后。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内部改革，这种改革不仅是改造旧的殖民地经济结构，而且要对整个社会进行真正的革命改造。要解决这样巨大的任务不能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不能不运用社会主义体系为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各种经济和政治上特别有利的条件。改造的内容取决于领导这些国家的政权，而政权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社会的阶级结构的。

①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1月22日）。〔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四卷，第102—103页。——译者〕

② 同上。〔同上，第103页。列宁的原话与本书引语稍有出入。——译者〕

殖民主义剥削是施用于不发达的条件的，因社会的主要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都很薄弱（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来看这些“主要阶级”）。除了个别一些国家（印度、菲律宾）外，在解放了的国家里，工业资产阶级不能代表资本家阶级，在这些国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投机商、建筑业的包工头、掮客、现代买办资本家，以及在非生产领域中拥有资本的那些人。工业无产阶级在很多国家里，力量薄弱，很不成熟，还没有组织起来。

阶级结构的这种特点，决定了中间和中等社会阶层在社会中占有重要的份量^①，在政治生活中起着较大的作用，这首先是国家机关的职员和知识分子（高、中等学校的教员，以及被“中等阶层”团结的自由职业者），其中包括军人知识分子，即军官。

这些握有军权的军官通常能够迫使国家向某个政治方向发展。近二十年来的事实表明，在许多国家里，军官充分利用了这种可能性。仅在近十五年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约有三十个国家发生了大约四十次成功的军事政变。这说明在“第三世界”军队干预国家的政治已经成为惯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里，政权落入军人手中已经不是例外，几乎成为一条法则，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规律的事实。

直到六十年代初，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对于这种规律性的事物几乎还没有研究过。分析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

^① 我们认为，半无产者、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企业主、即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城市下层群众是中间阶层，他们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地位。而职员、自由职业者、大学生和军官属于中等阶层。

主要是停留在无产阶级、农民、资产阶级和地主“四项式”概念的框框内。知识分子、中间阶层、军队通常都没有纳入科学工作者的研究范围，只是近期以来，这些社会阶层由于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已很明显，因而才成为研究的对象。

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旨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这门学科中填补空白。本书的任务是要探明战后在一系列亚非国家中军队登上政治舞台的规律，弄清楚年轻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军队急剧加强干预政治生活的原因和前提。

军队在各种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远非相同的，要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是困难的，譬如，伊拉克军队在一九五八年的反帝革命中是先锋力量，而在一九六八年前的这段时期内，在许多方面却又阻碍社会向进步方向发展。印度尼西亚军队曾经是反帝革命力量之一，但是由于它的领导信奉反共主义，从而导致军队两次参与对左派组织的残酷迫害。因而，要给战后以来的所有军队简单地说成进步的或反动的，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本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探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军官阶层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向守旧和反民主方向发展的根本原因。

按照亚非国家军队的性质，可分成四类：一、非殖民地军队，即原来国家的或形式上是主权国家的军队，但掌握这些军队的国家仍以这样或那样的表现形式带有殖民主义影响的烙印。属于这种类型的是土耳其、伊朗、埃塞俄比亚、阿富汗、泰国、也门等国的军队。二、前殖民地军队，即由殖民主义者建立而由民族主义政权继承的军队，如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

叙利亚、埃及、扎伊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军队。三、在民族解放战争过程中建立的军队(缅甸、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四、民族主义国家建国后成立的军队(属于这种类型的是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军队)。

在第一、二类军队中，最高指挥官通常同旧的特权阶级有联系，军事教育和思想训练主要都是在宗主国的军事院校接受的。将级军官都是保守的，大部分是亲西方的。但是在某些国家里(埃及、北也门、叙利亚)在革命政变过程中旧的高级军官基本上都已被清除，现在这些军队按其领导成员的组成来说已接近第三、四类。第三类军队按其成立时间来说，最为年轻，其中职业(科班出身的)高级指挥官也最少，这些年轻革命家基本都出身于自由民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在独立战争时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军事斗争。当然其中许多人在过去这段时期已经完全职业化，并且沾染了某些军阀官僚的习气。第四类军队，基本上原来都是警察部队，他们没有战斗经验和政治威信。

在建立军队时，殖民地政府总是尽量从少数民族或边远地区和最落后的居民中招募士兵和军官，这种别有用心的政策，目的在于建立一支对于殖民主义者较为可靠的殖民地武装力量(在落后地区要渗进进步的爱国思想是困难的)，这种政策还可以挑动有反帝情绪的大城市居民、农民和这些山区士兵之间的仇恨。用这样的办法，即使在较发达的国家里也就可实现专制政权的领导。

亚非国家独立后，原属殖民地和没有经过反压迫革命战争而获得解放的国家，实际上继承了殖民地政府建立的军队

(或是由它派生出来的),按我们的分类,这样的军队属于第二类和第四类。所以在这些国家的军队中或是保留了原来由殖民主义者培训的军官,或是指挥岗位仍由那些受过军国主义教育的旧军官所占据。有关这一问题,下面我们还将进一步分析。现在我们先来研究军队在年轻的民族主义国家生活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

军队是民族主义国家主权的象征,实际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民族主义国家虽然完全没有必要由军队来防御外敌,但是他们都愿意有自己的武装,要它们放弃军队那是不可能的。在非洲许多小国中,无用的军队在国家生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国家都认为有自己的军队是合理的,在从殖民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国家中,任何一个掌权的政治家都怕受到反对爱国主义的责难,不敢提出放弃国家军队的设想。由于同样的原因,反对派也不敢提出类似的主张。

同时还要考虑到即便将领和军官的人数再少,但他们支配着国家唯一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他们能够动用这支力量来坚决反对任何一个力图取消军队的文官政府,后者也很清楚这一点。

因为强调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则将给财政开支带来沉重负担,但可以提出下列理由作为充分的根据,例如,存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同邻国的领土争端或其他纠纷,少数民族的分裂主义运动,等等。

应当看到,本国军队的存在是得到人民支持的,由于人民在几十年以至百年内失去了国家和自己的军队,他们看到

本国军队，便认为是独立的标志和主权的现实体现，认为这证明他们同耻辱的过去已彻底决裂，外国人在他们的国家主宰一切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此外，在多数国家里，就军队的职业而言，在传统上也是受到尊敬的。属于例外的情况只有中国，那里流行一句格言，叫做“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在印度的种姓制中，军人（刹帝利）仅低于婆罗门。又如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给予军人在社会教阶制度中很高的地位。但是在殖民统治时期，由于当兵不是为国家，而是为殖民主义者服务，所以军队不吸收有民族主义情绪的青年。现在情况已根本改变了。

还有一点，对于农民的子弟来说，服兵役不仅是荣誉，而且给予进入社交界开辟了美好前景。无论何时，这对于他们总是一条最好的出路。所以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人们不正确地把士兵看作是“穿军衣的农民”。不管怎么说，军队是属于有特权的、受尊敬的和常常能够左右社会的组织。要把阶级觉悟不高、识字不多的青年农民士兵和农民本身区别开来。士兵在不小的程度上已经反映本阶级的情绪，他们认为自己是属于有特权的社会阶层，并且害怕失去这样的地位，他们顺从地跟随军官袭击总统府或者在广场上驱散人群。这些情况为本书论证军队是唯一的力量提供了根据。只有在军人政权开始公开反对农民时，军官才会失去士兵的信任。那样，士兵“社会内部”便可能发生叛乱。显然考虑到这一点，军事当局往往表白自己是“倾向农民的”。

由于军队有崇高威望，自然它比社会的其他机构优越，从而为它登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可以确信，军队在这种情

况的国家里是全民族的机构，即这些国家的民族尚处于形成阶段，全民族的交往很少，那里的家族、氏族、种族以及地区联系决定人们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超过对整个社会的感情。从太古以来在群众心目中，国家与其说是民族主权的象征，不如说是行政强制机构。在人们的意识中早就懂得氏族、种族、乡村、阶级、教派等类别。各阶层的群众，不同地区的人，不同种族和社会集团的代表汇集到军队中。不识字的农民的眼光局限于狭隘的农村，但在军队中同其他地区和别的社会阶层的人相遇，在共同的民族大家庭中和各种人接触，这才开始觉悟。也就是说，军队可以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觉性。所以军队又可以看作是民族统一的象征，主权的化身，成为国家的一个特殊机构，具有独特的性质，它比其他机构的地位优越。

而且军队是最现代化的社会工具。甚至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军队也不得不在军事科学和技术方面，以某种程度达到一般的现代化标准。行政机关、国民教育、文化和科学，以及社会生活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停留在原始水平，特别是当一些国家同外部世界隔绝时，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如也门、埃塞俄比亚、阿富汗等在近期发生的事变以前就是这样）。在所有这些领域内不一定要向别的国家看齐，但在军队方面，这样是不行的。按军队的特点来讲，它是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它是被用来抵御外敌的，不能让它的训练和装备落后于敌人的水平。所以竞争和向外部世界看齐是军队固有的天性。必须把军官派到外国去学习或者是从外国聘请教官，必须使军官们了解世界上的技术成就和外国军队的组织情况。于是，不可避免地就会使人进行对比。谁也难以做到象军官那样敏锐地发觉

国家的落后，因为他们在接受军事教育过程中，不仅了解其他较发达国家的军队状况，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知道这些国家的经济、科学和文化方面的进步情况。觉察到本国的落后状况就可以提高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责任感，激发他们起来为消灭外国统治、改造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最后重建这个社会而斗争。换言之，这样的过程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中，是依靠许多军官的思考、即依靠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来实现的。

按照现代军队的发展情况，参谋部的工作日益重要。参谋军官的人数也就是知识分子在军队内部的人数，因参谋人员都是知识分子。按照工作的性质，参谋军官必须懂得外国的各种新式武器和了解外国的技术进步情况，关心军队的现代化。这些军官是落后社会中的进步力量，对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和低水平之间的差距特别敏感，知道社会如果不摆脱外国的控制、不走工业化的道路、不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而停留在这样的低水平上，那么这种社会就有濒于灭亡的危险。^①

如上所述，在落后社会中，军队是唯一的全社会的机构，它超越于传统停滞的带有宗教种族观念和偏见的世界之外，超越于分成为阶级、宗派和集团的世界之外。所以它具有各种政党所不具备的优点，政党除共产党以外通常是同狭隘的集团利益相联系的。军队同它们的区别在于它在人民面前是

^① 意大利的军事问题专家阿里多·里茨佐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里，“军官通常都是外国军事学院毕业的，他们到过许多国家，接触面很广，这些人必须懂得非常复杂的武器和战略，通晓现代技术，成为上流社会人士，自己意识到要担任指挥官，而实际上也经常指挥。”（《前景》周刊，1973年10月4日）

全民族的力量。

还要补充一点：军队，首先是军官阶层，经常注意内部的团结。在一切军队的军官中，都注意培养团结和爱国主义的典型，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属于特权阶层和享有团体威望而感到自豪。

管理集中、军阶制度严格、有纪律、内部联系方便，所有这些同社会的一般组织相比，武装力量是强有力的，当它们去完成政治任务时，便能够提高军事行动的效率^①。

但是军队同所有的社会其他机构和组织相比，它的主要优点还在于独占军事实力。军队拥有武器，并能够使用这些武器。比之其他组织，军队能在最大程度上使用暴力。军队按其特点，是有组织的暴力工具，军人是专门“使用暴力的专家”。如果军队团结一致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那它百分之百能获得成功。在战后历史中，亚非国家还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军队团结一致，有人能够违背军队的意志去进行几次国家政权或社会政治的重大改革。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军事首脑得到军队全力支持或未因政治动荡而丧失自己的权威，有任何其他力量能解除这些军事首脑的职权。一九六四年，苏丹推翻了军事专政，代之以文官执政，这样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仅仅是因为很大一部分中、下级军官倒向革命运

^① 意大利心理学家埃米里奥·谢尔瓦焦也确认：“过惯了兵营中的生活，兵营的纪律和军阶等级有着无可怀疑的区别，命令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讨论的，敏锐的思维能力等于是多余的，从而形成专横主义，这种专横还从军内极力向外扩展，结果是不可避免地把这种绝对服从的制度扩展到生活中。”（见《前景》周刊，1973年10月4日）

动，并带走了士兵群众。顺便指出，在“第三世界”，军官几乎经常都能依靠一般是从政治上落后和受压制的农民中招募的并听从他们命令的士兵。这种情况便有利于他们采取政治性的军事行动。

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军队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的，尽管这些国家并不希望实现军事统治。一九五三年，伊朗军队顺从地跟随反动的将领在保护王国的口号下镇压了革命运动。伊朗国内的进步力量是很大的，但军事力量成了决定性的因素。一九六八年，马里军队仅仅在不多的几个小时内利用了群众的愿望就推翻了总统。加纳仅几百个士兵遵照反动军官的命令，就推翻了拥有全部政权和操纵除军队以外的一切关键部门的制度。

军队作为暴力工具，它能够粉碎抵抗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决定。军队是意识到了自己的特殊地位的：它最有效率、有组织，是全国最现代化的力量。军队特殊作用的教育在军官中间经常进行，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既是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者，也是负有历史使命的力量。对于确信必须进行社会变革的军人来说，意识到这个使命，也就容易相信军队是实现这个变革的先锋力量了。

军队积极参与政治的过程正在发生（这里和下面所讲的军队首先是指有政治头脑的人，它的首脑就是军官），军队跳出它一般的“天赋”职能的框框，它就开始意识到自己可以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这里应当明确指出：实际上军队整个都是政治力量，不过有些军人自己还没有觉悟到这一点罢了。武装力量是为国

家服务的，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所以军队通常总是属于政治组织的。但另一方面，在政权制度中，如果按职能进行“标准”划分的话，直接管理国家的职能并不属于武装力量的职权范围，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就是说，在这样的政权制度中，军队已经有点越轨了。但就性质而言，军队不能不是一种政治力量，这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就可以“制定政策”和领导国家。

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中，说军队超然于“政治之外”，那不过是形式，其实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它已经和政治相联系，并按照统治阶级所制定的方针行事。列宁曾经指出：使军队不问政治，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伪善的奴仆口号，实际上他们一向都把军队拖入反动的政治中。^①但是，军队充当统治阶级意志的执行者来影响政治是一回事，而当它客观地被派去推翻这些阶级或它们的代理人的统治，则又是另一回事，如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缅甸就曾是这样的情况。^②

热带非洲的许多国家甚至发生军队实际掌握政权的情况，以保护上层特权阶级不被推翻，因而，归根结底，它的行动是服从于上层的利益的。尽管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但在这些上层人士看来，不求助于武装力量的帮助，就会失去对政权的直接控制，就不能保证自己的统治。只有在下列情况下，上

^① 列宁：《军队与革命》。〔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十卷，第35页。——译者〕

^② 现代资产阶级作家明确认为，军内问题是首要任务，如美国研究工作者G. C. 洛奇写道：抵御外敌是武装力量职能中“最次要的部分”，而它的“主要职能是镇压文官的捣乱，防止内部的破坏活动和在政治斗争过程中保持一支随时可以动用的威胁力量。”（G. C. 洛奇：《变革的动力》，纽约出版，1970年，第177页）

层的危机才可能发生：即这些保护上层利益的军队认为必须推翻这些上层人士的政权，或认为至少必须撤换部分领导人，否则没有别的出路。显然，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政权制度本身的严重缺陷，发生军事政变的那些国家有各式各样的政体，从专制政体到议会制度。原因是比较复杂的：“第三世界”政治不稳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紧张，这种紧张通常是同非殖民化的进程效率不高和速度缓慢相联系的。从而为军队干预政治提供了口实，这种干涉能够或者有助于实现上述的政权更迭，或防止这种更迭。^①

军队登上政治舞台究竟有那些前提条件？什么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会发生军事政变？

许多研究工作者都想找出一个“公分母”，希望最好能够找出某种标准：在“第三世界”，什么样的国家会发生政变，什么样的国家则不会发生。这样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生活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军事政变几乎在各个国家都有可能发生。军队夺取政权既可能发生在尚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前的那些非常落后的国家（如也门、阿富汗），也可能发生在资本主义已经有相当发展的国家（如埃及、叙利亚）；军队既推翻那些保守的君主制度（如伊拉克、也门、阿富汗），同时也推翻那些奉行革命进步方针的政府（如加纳、马里）。但不能作出下列论断：似乎政变绝大多数都发生在“第三世界”最不发达的国

^① 美国学者 T. 维科夫写道：“军人执行适合于本国政治条件的行动方针，他们自己并不认为对有无民主负有责任……，军人的政治作用不是‘政治病’，而是政治上非常幼稚的表现。”（T. 维科夫：《军队在拉丁美洲政治中的作用》，《西印政治季刊》，第13卷，1960年9月，第761页）